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陆毅 蔡熙乾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二者共生共荣，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立业之本。《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中多篇著作都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作出深刻论述。比如，《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出：“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不能脱离实际”；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关系。深入学习《文选》中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才能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在总量调控方面，进一步发挥总量性货币政策工具在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灵活调整政策节奏，在经济扩张期适度收紧流动性，防范出现经济过热风险；在经济承压期加大流动性投放，激发投资与消费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稳定器作用。通过有效调节货币供应量与信贷增速，保持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为经济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结构优化方面，进一步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与传统的总量调控工具相比，结构性工具更注重“精准滴灌”，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等方式，将央行资金与金融机构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信贷投放紧密挂钩，有效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融资成本。例如，通过支农支小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增强对“三农”、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与有效性。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以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为重要抓手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必须以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为着力点和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为构建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指明了方向。构建现代

金融机构体系，要完善机构定位。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与配置作用，聚焦重点产业、关键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做强做优、稳健经营，充当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中小金融机构需要“减量提质”，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强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补齐服务短板。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厘清边界，聚焦服务国家战略，主要做商业性金融机构干不了、干不好的业务，为商业性金融机构不能覆盖的领域提供补充。同时，要推动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多元化产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融资选择。

此外，还要不断完善市场体系，优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重，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要加快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融资结构。资本市场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本形成、完善公司治理等功能，助力新型工业化发展，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债券市场制度建设。债券市场作为筹措中长期资金的重要场所，能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高效稳定的直接融资渠道。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债券发行、交易和管理制度，提高债券市场市场化定价能力和市场韧性，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为重要途径

开放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制度规则，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逐步扩大金融领域的规则、规制和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型开放，增

强金融领域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吸引更多长期资本和优质金融机构来华展业兴业。另一方面，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还应着眼于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实体经济更好地“走出去”。要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拓展企业境外投融资渠道、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助力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与创新链合作。此外，不断完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通过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投融资渠道、丰富投融资主体等方式，构建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加稳定、高效、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必须统筹兼顾金融安全。完善的金融安全保障体系，既能避免金融市场动荡引发经济衰退，又能增强国际投资者信心，吸引更多优质资本和机构，提升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力。为实现金融高水平开放下的高水平安全，需从多方面协同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应持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开放，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与抵御风险能力，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属性，以及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韧性，夯实金融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金融开放必须守好安全底线，做到“放得开”“管得住”。着力提升监管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管理，优化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分析、评估、预警机制，丰富政策工具箱，有效防范国际风险的外溢和冲击，强化监管全覆盖，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活动。同时，加强国内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行动协同，避免出现监管空白和重叠，切实筑牢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防线。

(本文刊发于《人民日报》，有删减)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山区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纵深推进研究

——以龙泉为例

黄思源

合行政处罚、监督检查及强制执行事项，形成最新《龙港市镇街综合执法事项调整目录》。其中，4个街道行政处罚事项调整为目前16个领域243项，6个乡镇调整为14个领域208项。二是优化执法队伍。实行“局办合一”模式，明确构建一个执法体系，目前整合“1+8”执法队伍，下沉10个执法队至镇街，实行“1+X”模式，实现执法力量全域覆盖。三是推动人员下沉。下沉模式调整为“派驻制”和“联系制”，“派驻制”分为“属地”和“片区”，“联系制”人员由派由部门负责管理，落实“乡镇吹哨、部门报到”要求。实行下沉人员和编制“双锁定”，目前有192人下沉镇街。

在强化协同机制建设上，健全监管执法体制机制。一是组织机构保障。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出台全领域“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实施方案、重点任务清单和下沉人员管理考核办法。成立综合信息指挥中心，赋权镇街成立综合信息指挥室，一体化推进区域执法、联合执法。二是体系机制保障。建立监管执法协同机制，明确主管部门、镇街政府和执法局在信息共享、执法协助、业务培训、监管巡查等方面的协同责任，强化“一件事”和“吹哨”机制，建立执法保障和监督机制，开展“综合查一次”“最多查一次”活动，构建起全域性执法监管协同体系。三是队伍能力建设。开展“执法夜校”重点学、集中和分头学活动。自2022年以来，累计开展执法夜校100余期，晾晒镇街执法队“三张报表”大比武，参加学习考试2000多人；举办全市综合执法业务培训，切实提升执法人员能力。强化执法后勤保障，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系统构建监管执法数字平台。一是推动执法监管数字化应用。贯通省“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启用省统一处罚办案系统2.0版，启用执法监管数字应用融入基层智治系统，启用执法证据共享应用，开展执法协同业务；推进监管、检查、处罚事项纳入数字执法平台，形成多跨协同模式，并将“1411”体系与基层治理大脑融合。二是数字化应用成果较丰。首批梳理了盗土开采、刀剑管制等5个“监管一件事”，并拓展至11件，其中林业监

管执法协同工作、管制刀具“一件事”做法分别在全省现场会、座谈会作交流发言；打造“最多查一次”应用场景、“综合查一次”场景清单，2022年以来共开展涉企联合执法检查500余次，通过“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有效减少执法扰企；构建“非现场执法”系统，打造“秸秆禁烧”等平台，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

龙泉通过一系列手段有效破解了改革难题，在行政执法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提升了执法效能，还推动了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和智能化发展。据相关数据统计，2022年共办理案件526件，通过“三张报表”实现拆违零上访、执法零舆情、办案零败诉；2023年执法部门普通程序案件结案903起，执法队办结343件；去年联合司法局开展全市案件规范大排查，全年执法局及镇街办理普通程序案件1000余起。在县级层面，综合执法主要工作正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方向转变，镇街层面基本扭转了权责和利益倒置的长期不良局面。

基于整体政府的山区县综合执法改革路径

我国综合执法改革以整体政府理论为指导，针对传统科层制与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治理碎片化困境，构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运用整体政府理论，结合龙泉实践，山区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可从整合、协同、保障、数字化等维度深化，提升整体性效果。

(一)改革的整合路径
在权限整合层面，治理纵向部门间协调性不足，要求涉及改革的多个主体“扬弃”自身利益，改善组织机构运作形态，促成良性互动。根据“权责一致、事能相配”要求，整合执法权限，须从山区县实际出发，合理划分主管部门与综合执法部门的执法监管职责权限及边界，推动权责由横向向纵向配置调整；真正把部门多头事项突出、基层高频高发易发事项赋权给镇街，推行事项目录清单制度，确保事项动态平衡。在人员整合层面，现行《行政处罚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仅认可行政处罚权下放。整合不是简单的权限增删，而是有“制衡”和“监

督”意义的对行政权的严格切割。要以整体政府推动改革重心从“权力”向“责任”共同体调整，融合执法资源，加强下沉力量。

(二)改革的协同保障路径
改革协同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再造与组织创新双轮驱动，而“保障”广义上也包括协同、数字化。在制度层面，执法监管协同通过体系再造、统一标准和力量统筹在执法过程中实现。明确相关各方协同责任，推进执法公示、记录、审核三大制度全覆盖，健全监管执法协同机制，完善法制联审制度。具体通过执法协同、分级分层监管县域顶层设计，加强合作，接续实施“综合查一次”制度，加强统筹全域执法监管力量。在组织层面，实现执法效能提升，建立促进协同的协调型组织是前提。发挥党建统领优势，推出协调型组织保障。增强整体政府意识，统筹确定相互关系，统筹安排综合执法改革与其他改革的配套措施，不断增强协调型组织功能；加大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力度，打造部门间既合理分工又积极协同的全链条、场景式闭环监管执法体系，坚持以党内、纪监和公众监督，压实对监管执法的监督。改革还需要法律领域默契的程序机制。

(三)改革的数字化路径
数字化路径则聚焦技术赋能与能力提升双重维度。在深化赋能上，统一开发的整体智治系统为改革夯下了技术基础，通过数据平台推进协同治理，借助新技术提升执法效能。进一步用好综合执法数字化平台，以机制创新推动相关中心实现“化学融合”，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健全城市治理数字生态体系，建强城乡协同指挥平台；通过深化赋能促进执法体制重塑、体系再造，提升执法数字化水平。在能力建设上，以数字化执法能力建设为重点，加强执法人员的职业化训练和数字化能力培养，开展整体智治的数字化培训，完善执法资格等级认证制度；健全派驻人员工作保障机制，完善绩效管理机制。提升执法人员数字政府理念和技术能力，打造数字化服务体系；通过完善数字化监管机制，监督政府组织行为，提升群众满意度。

(作者单位：中共龙泉市委党校)



观点快递

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

民生之事无捷径，实干方能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指出，“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实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要求政策设计和执行要充分践行“实”，从理念到执行都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具体生活的土壤，确保政策举措取得实效。

“实”既是做好民生工作的方法，也是优良作风的体现。“实”的方法，要求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少数地方的民生工程沦为“面子工程”，惠民政策“水土不服”，政策红利被“中梗阻”“最后一公里”截留，真实民意被“数字政绩”取代等现象，究其根源，都是偏离了“实”的准则和方法。“实”的作风，要求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思想和制度层面双向发力。一方面，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从会议室走向村头巷尾，扎进“泥土芬芳”，自觉将“实”的作风融入血脉、践于行动；另一方面，要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增加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指标的权重，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

“征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只有聚焦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将“实”字贯穿民生工作全过程，深入研究并推出一批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民生政策举措，并以实干精神将政策落到实处，才能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政策带来的便利与福祉。

(据《学习时报》)

盘活存量 提升公共服务增量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共服务资源闲置与需求缺口并存恰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盘活存量资源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必由之路。

公共服务资源高效利用的前置条件，是建立科学前瞻的规划配置体系。民生服务需求错配与资源浪费的风险，对前置规划的科学性和动态评估的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以科学规则为指引，可以推动“经验判断”转向“有规可循”，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使公共服务资源精准可及、适配民生所需。以科学规则为资源调度引航，能有效提升新建设施使用效能，激活老旧设施剩余潜能，整体优化资源配置格局，适应社会动态需求。比如，上海市杨浦区前置公共空间规划方案，集中壁画发展蓝图，引领“一江一河”“生活秀带”建设，通过预先设定公共空间建设标准，确保滨水公共空间在整体协调中彰显历史特色。科学的规划拓宽了城市发展空间，打造了功能齐备、特色彰显、全民共享的服务配套设施体系，使昔日的“工业锈带”蝶变为今日的“生活秀带”。

公共服务“存量盘活”，要求系统梳理、摸清家底，定期盘查闲置服务资源。针对闲置资源特性、标准与适用条件，探索公共场所以开放原则与市民需求、公共文体设施使用规范与社会使用率之间的最优适配方案。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提升公共设施运营水平，推动闲置服务资源转化为群众身边可感、可及的获得体验。各级各地民生需求、服务资源禀赋不同，公共资源的管理运营模式也须因地制宜，探索个性化、多元化运营方案，畅通存量向增量的转化渠道，切实增强服务供需适配性，充分激活闲置资源效能。比如，浙江省杭州市为公共文化场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先行探路，由国有文化企业打造市场化运营平台，探索公共文化空间一体化运营模式，并将运营收益反哺于社会公益，让闲置空间转型为文化服务与消费融合的城市新地标。

让存量资源释放活力，向存量资源挖掘效益，大力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当每一处闲置场馆重现生机，每一份社会潜能得到释放，由此铺就的是温暖的民生底色。

(据《光明日报》)

全链条构建智算人才生态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算力作为核心生产力，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中智算作为算力产业的新兴分支，凭借其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推理等场景中的核心作用，成为推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关键。然而，随着技术迭代加速、国际封锁加剧、应用场景多元化，智算产业也面临着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面对时代需求与现实挑战，亟需构建智算人才生态，以推动智算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数字经济时代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市场投研分析人才，即战略决策团队。智算中心建设涉及大额投资，且技术迭代周期极短。若缺乏对行业趋势的精准预判，巨额投入可能因技术过时而迅速贬值。这类人才需深度理解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导向，掌握核心设备供应周期与价格波动规律，以及金融工具应用能力，例如通过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ABS)优化资金结构，规避重资产项目风险。

智算中心设计人才，即整体规划设计者。单台GPU服务器功耗高达数十千瓦，传统供电与散热方案难以匹配，业务波动性更要求机房具备弹性扩展能力。设计者需融合绿色能源技术、模块化架构与老旧机房改造方案，例如在东部高电价地区采用液冷技术降耗，或通过动态设计灵活调配算力资源，平衡“双碳”目标与经济可行性。

智算IT组网与运维人才，即IT技术人才。智算中心运维复杂度高远超传统数据中心，需对异构计算环境优化、多平台资源池化及国产芯片适配等挑战。例如在推理场景中通过量化压缩技术降低算力依赖，或在训练过程中动态调整资源分配提升效率。运维人才需从“设备维护者”转型为“技术整合者”，兼具硬件调试与算法调优能力。

智算消纳场景开发人才，即综合性商业人才。当前算力资源多集中于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而制造业、医疗等传统行业应用尚未充分挖掘。这类人才需要探索应用场景的拓展，将抽象算力转化为行业解决方案。例如为智慧城市设计交通调度模型时融合算力分布与实时数据，或为药企搭建分子模拟平台时平衡计算精度与成本，推动技术向产业价值转化。

融资和资产资本化人才。智算产业的重资产属性与长回报周期，要求企业具备强大的资金运作能力。这类人才需结合自身企业情况，在需求与金融工具之间架设桥梁。这一过程不仅需要熟悉金融规则，还需理解智算项目的风险、收益与运作特点，做好金融与产业的结合。

(据《经济日报》)



瓯江论坛

今年是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收官之年，该项改革已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积累了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近年来，浙江紧扣法治建设和治理创新要求，依托新公共管理理论，不断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该项改革既取得整合执法队伍、重构权责体系等阶段性成果，也面临着如何克服严峻法律挑战和体制性障碍、如何破解县域碎片化困境等深层次矛盾。

学界对综合执法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探究、困境揭示和实现路径。王余生等认为，整体政府理论同我国综合执法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并据此发现执法机构、权责、机制、方式等碎片化问题，综合执法改革内蕴并依循了整体政府要求。丁煌等认为，需运用整体性治理构建我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模型及深化路径，推动改革模式从横向配置向纵向配置调整，重心从权力共同体向责任共同体调整。赵玲玲指出，整体智治实践可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学者们从法律供给、职责界定、加强协同等方面提出了有效改革路径。

龙泉“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历史检视

2022年以来，龙泉着力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改革，随着综合执法队的组建，赋权事项骤增，亟待探索整合执法力量新模式予以整合。龙泉以整体政府为统筹，从整合资源、权责界定、人员下沉、加强协同等方面，初步形成了职能清晰、协同高效的行政执法规格局。

在整合方面，着力完善综合执法体系。一是整合执法权限。有效整

值班编委	邓其锋
夜班主任	蓝东涛
审读	王路
夜班编辑	潘艺之
夜班主编	王少剑
电脑组版	
一版	黄莹莹
二版	李红伟
三、四版	徐锡伟